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首席顾问亚·雅科夫列夫论：

“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

高洪山 冯又松 阎亚平 等译
纪然 校



381

404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首席顾问亚·雅科夫列夫论：

“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

高洪山 冯又松 阎亚平 等译
纪然 校

吉林人民出版社

“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

高洪山 冯又松 阎亚平等译

纪然校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56印张 268.164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900

ISBN 7-206-01383-X/B·400

F·1 定价：5.50元

(内部发行)

本书第一至五部分由高洪山、冯又松、唐项登、张汉毅、覃明贵、马景昆、黄维明、孙黎明、吴立平译；第六至七部分由阎亚平译。全书由纪然统校。

出版者的话

苏联的解体，是1991年震撼世界的大事，也是20世纪世界史上的大事。其影响广泛深刻，为世人所瞩目。苏联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样一个具有近70年历史（1922年，列宁亲手缔造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拥有2240万平方公里土地、2.9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为什么“忽喇喇似大厦倾”，自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任以来短短几年功夫就演变和解体了？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重大课题。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有远因有近因，有内因有外因，但是，长期以来没有把同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经济建设搞上去，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前车之覆，后者之鉴。认真研究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及其教训，对我们坚持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切实把我们国内的事情办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译介或撰写了一些有助于了解、研究苏联演变和解体过程、原因及教训的书籍，供党政军各级领导同志、教研人员及其他读者同志研究时参考。

本书原名为《痛苦，读书，生活》，副题为《改革：希望与现实》，是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首席顾问亚·雅科夫列夫所作，1991年由苏联“新闻出版社”出版。本书实际上是作者对自己近几年来协助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与“新思

维”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文章的集纳。在苏联国内外，亚·雅科夫列夫曾被公认为“改革之父”，他也是“新思维”的始作俑者之一。该书集中地全面地反映了作者参与制定、积极推行“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背景、过程、后果，反映了作者在“改革”和“新思维”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充分展示了“新思维”与苏联演变、解体的关系。为此，译者把雅科夫列夫的这本书定名为《“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研究该书对于了解苏联解体的一些深层原因，如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方面原因，是大有裨益的。

本书作者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 1923 年生于俄罗斯联邦雅罗斯拉夫州的一个农民家庭。1941 年参加卫国战争，1943 年因腿部负伤从前线回到家乡，进入雅罗斯拉夫师范学院学习，1944 年入党，1946 年毕业后至 50 年代初曾先是留校任系主任、后任州《北方工人报》主任、州党校教研组长，并在州委机关工作过。不久，又被选送到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高级党校）学习。50 年代末，当赫鲁晓夫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时，他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回国后，自 1960 年起留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曾任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1965 年 7 月晋升为苏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兼《共产党人》杂志编委。1970 年毕业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他本人曾是一位教授和历史学博士。他在 1972 年 11 月 15 日的《文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对非历史主义的批判》一文，因措词尖锐，触犯了当时苏联理论界和文艺界一些人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在党内外反映强烈，因而不宜留任原职。旋即，他于 1973 年 6 月被改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一去就是 10 年。这 10 年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趋于

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相对来说摆脱了经济危机，在新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快发展；而苏联在同美国进行长期争霸后却陷入了停滞时期。亚·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期间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发展，系统接受了西方政界要人和学者关于同等安全、裁军、核毁灭、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等思想，其思想观点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他后来参与制定“新思维”的理论和政策奠定了基础。

1983年，亚·雅科夫列夫与前去访问的戈尔巴乔夫一见如故，十分投机。同年，他被调回国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该所是苏联当时最大和最权威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经常向苏共中央制定对外方针政策提供咨询意见。该所被西方称之为苏联的“思想库”和“兰德公司”。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许多观点，实际上出自该所的一系列研究报告。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亚·雅科夫列夫的地位也随之不断上升。同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把当时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中央委员的他提拔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1986年2月，在苏共27大上他当选为中央书记，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他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与利加乔夫一起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戈准备倚重他来为“改革”与“新思维”大造舆论。同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后，意识形态工作改由他一人负责，而利加乔夫改任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亚·雅科夫列夫改任苏共中央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以后，苏联实行总统制，亚·雅科夫列夫出任总统委员会的首席顾问，直至1991年“8·19事件”之前他宣布退出总统委员会止。尽管几年来他

的职务和工作不断变化，但始终没有离开宣传和推行“改革”与“新思维”这个轴心。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提出和系统化，同他也是有直接关系的。据报道，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就是由他主持起草的。在本书中，亚·雅科夫列夫毫不隐讳他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关系。例如，1990年7月2日他在苏共28大上的发言中说：“我作为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虽然不准备夸大自己的作用，但我认为自己与制定和实行新政治思维主张密切相关”，积极“参与了同发展民主化和公开性有关的活动。”

在总的政治倾向上，亚·雅科夫列夫的一系列观点较之戈尔巴乔夫更激进得多。在本书中，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苏联70年来的社会主义历史以及苏联共产党等，进行了种种诋毁和侮谩，极力主张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例如，他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只讲矛盾的斗争性，否定矛盾的同一性，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学说，认为阶级斗争学说虽然是“天才的”，“可惜我们应当拒绝这一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上一个世纪社会思想的一个流派，完全有其存在的权利”，“但是当它成为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党的思想体系，并被应用于20世纪的条件时，它实际上就失去了自己作为行动指南的科学价值”。认为列宁“在总体上还是十分信奉马克思学说的，但是很遗憾，他把革命暴力、恐怖主义、轻视公民社会和中间阶级的思想也搬到了俄国的土壤之上。”如果“按照普列汉诺夫模式引进”马克思主义，“还可能被科学地利用”。亚·雅科夫列夫虽然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的社会主

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他否认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竟然说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如果社会主义者不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己任，别人也会把它担当起来”，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道德伦理内涵”就在于复活了“早期基督教理想”，它同早期基督教思想“有本质上的相似”。戈尔巴乔夫在“8·19事件”之后也有过类似说法。亚·雅科夫列夫从他的社会主义概念出发，全盘否定苏联70年来的社会主义历史，认为十月革命不过是先辈们对“自古以来的社会主义假想”的一种“迷信和奢望”，而在当时落后的俄国是不应当搞社会主义的；认为苏联几十年来建立的社会主义是“独裁”、“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是“部门封建主义”，必须加以彻底“摧毁”和“抛弃”。他说，苏共由最初作为“思想的党”到后来成了一个“权力的党”，因而是“错误”的；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一样，“都有其局限性”。他对曾是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尽管偶尔说几句“不可用先验的观点为斯大林开脱，同样，也不可加罪于他”之类的貌似公正的话，但从根本上说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他对斯大林的错误片面加以引伸夸大，进而百般攻击污蔑，目的之一则是为了把苏联现今存在的问题和6年“改革”中的错误、失败，一古脑地记在苏联历史帐上，以逃脱自己的责任。从书中还可以看到，他力倡一般的、抽象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主张建立美国那样的多党制和议会制，认为苏联改革“一开始就应实行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立”，而改革初期没有这样做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认为在核时代，“人类的道德应该只有一个，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全社会的道德，没有任何东西凌驾于它之上。所以说，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

切”，至于抽象谈论“个性自由、良心、秩序、善良、仁慈是最高道德典范”更是连篇累牍，比比皆是。可以说，抽象的民主化和人道主义是他的两个主要理论支柱。

上述表明，雅科夫列夫的思想观点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新思维”决不是专属戈尔巴乔夫一人的，而是戈和他周围一代人的思维，西方研究者把他们称为“战后的一代”或“苏共 20 大的一代”。雅科夫列夫在书中对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公开表示赞赏，称他本人因此而早在 60 年代就改变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的看法。“虽然某些同志作过担保，但我还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建成。”他几十年来的追求和信仰“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幻想”，是完全“建立在肥皂泡上”的。可见，在苏联解体以前，“戈尔巴乔夫们”在思想上早已瓦解了。苏联的解体首先是从思想上的瓦解开始的。“新思维”实质上是一种失败主义的思维。雅科夫列夫的这本书，就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它从反面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带研究性地读一读该书，对苏联解体的思想理论原因，定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苏联解体后，苏国内有位历史学家在批评戈尔巴乔夫时曾经说：“历史的判断，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状态。”“1985 年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那个国家，要比现在好得多。”这位历史学家提出的标准是普遍适用的，对雅科夫列夫也不例外，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对任何一种学说的最严正判决。几年来，雅科夫列夫辅佐戈尔巴乔夫的结果是，苏共瓦解，联盟解体，经济危机深重，族际冲突频乃，社会动荡不已，实践已经为他参与制定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了结论。

由于作者是学者出身，因而该书带有理论性、思辨性等特点，请读者在阅读时认真加以剖析，辩明是非。唯其如此，原文的许多地方比较艰涩。限于译者水平，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在翻译过程中，对一些内容重复的篇章和文字，稍作了一些删节。本书目录从原著目录顺序。

1992年3月

目 录

一、大家都来思考

- 随想录 (1990. 11) (1)
- 丢掉幻想 (1991. 5. 28) (16)
- 同美国新闻记者赫德里克·斯密特的
 谈话 (1989. 10) (26)
- 答美国有线电视广播 CBS
 记者问 (1990. 3. 8) (38)

二、代自传

- “我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俘虏” (1990. 6. 5) (48)

三、改革的哲学与我们的动机

- 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 (1990. 2. 12) (95)
- 一种社会病剖析：“总想找敌人” (124)
- 在民主基础上达成民主协议 (1990. 4. 7) (139)
- 实行个人负责制 (1990. 3. 14) (144)
- 全球道德与主体的政治权利 (1990. 11. 15) (146)
- 斗争为了和平，而不是和平
 为了斗争 (1991. 5. 16) (158)

四、战略选择

- 改革在实践中的反映 (1990. 2. 20) (166)
- 时不我待 (1990. 5. 4) (179)
- 寻找进行真正改革的力量和勇气 (1990) (191)

垄断真理有致命危险 (1990.7.2)	(202)
走向自由世界 (1990.7.8)	(210)
转产——对科学和社会的	
不寻常挑战 (1990.8.13)	(225)
民主的陷阱 (1990)	(229)
今后怎么办? (1991)	(239)
序曲已奏完, 变革之年就在	
眼前 (1991.1.5)	(241)
着眼于现实 (1991)	(247)
不要让个人成为国家任性	
的牺牲品 (1991)	(256)

五、认识历史靠真理

我个人的观点 (1990)	(264)
关于 1934 年的十二月惨案 (1991.1.28)	(278)
决不向邪恶屈服 (1991)	(295)
新德国与欧洲的未来 (1990.9.25)	(307)
新社会的诞生 (1990)	(317)

六、结论

谨防误入歧途…… (1991.4.20)	(329)
----------------------------	-------

七、革命正在进行

迈出新的步伐 (1991.7.2)	(350)
关于报复主义的危险性 (1991.8.16)	(357)
他们想使我们倒退到	
半个世纪前去 (1991.8.16)	(363)
“我凭良心办事”(节选) (1991.8.17)	(374)

一、大家都来思考

随想录

1990年11月

如果从1985年4月算起，改革已经6年了。不过，涉及苏联社会生活根本原则的改革要晚得多。1989年底开始，新政治思维的形成进入“读秒”的关键阶段：自由地、民主地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拥有一切权力，苏共党和国家的职能被彻底分开。1990年末才开始对经济进行根本改革。经济改革的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向市场经济过渡。这就是说，改革的重头戏，改革的重要成果和可以预见的主要困难都还在前面。

事到如今，改革必须进行下去。不仅要与保守主义、利己主义和习惯势力斗，还要讲究政治策略。总之，这是任何一个政治运动常有的事。而且，改革还要接受社会各方面百般挑剔的检验，包括对经济、贸易、金融、社会环境、科学、外交等改革的检验。为此，也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届政府所不能幸免的。任何特殊的“改革”是没有的。那种对自己的理论和这个理论指出的前景并非满意的改革是算不上改革的。

当时，我们要进行复杂而痛苦的自我揭露和自我认识。今天，当你回想改革之初时，你会清楚地看到，这正是当时最最困难的啊！对任何人来说，承认错误、失误和失败，向来

都是不愉快的，也是困难的。这里说的困难，就其性质、范围和深度而言，完全是特殊的。几十年来的自吹自擂使人们心中深深地扎下了这样的想法：我们走在别国的前面，我们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谁对这条道路和这些成就有不同意见、不同评价，他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

最令人难堪的是，在这种观点的驱使下，人们产生了许许多多最真挚、最纯洁、最虔诚的希冀、渴望和追求，但是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幻想。这些思想完全不是仅仅建立在肥皂泡的梦幻上，它也是建立在我国活生生的真实的功绩上，虽然这些功绩是大大夸张了的，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但它毕竟是实实在在的。至于对我们的理想和失误的忠诚也真是饱经磨难。

现在，对不少人来说，熟悉的世界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正在破灭。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再次证明，翻然省悟何其艰难！而省悟是改革最必须的不可或缺的开端。这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自信、智慧和善于掌握分寸啊。我相信改革的头5年不会作为破坏性的5年而是作为创造性的5年载入我国史册；在最尖锐的危机发展过程中培养了人的聪明才智，产生了追求真理、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能力。

我们只不过刚开了个头，刚刚完成向全新的国家经济体制、国家组织结构和精神生活方式的飞跃。现在正对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精神和道德环境等全部社会生活方式进行彻底改造。就是说，整个社会在变，每个人不管他愿意与否也在变。我们大家越来越成为符合本性的人了。

但是，感情和愿望，计划和构想总是超越实际的。当然，社会市场、有效民主、一个宽容的社会和法制国家的建立，这是未来多少年的任务，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是非常清

楚的。我们看到并且明白，就是在最好条件下，这些过程也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猛冲和制动、腾飞和下降、矛盾和冲突，一个意志和行动不坚决的国家尤甚。

看来，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革新，创作自由，政治开放，势必导致公民意识的产生，导致善良公正的胜利，提高社会道德、伦理和文化水平，结果是社会不断清除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变节行为、没有良心、贪得无厌等陋俗。

但是，不知从哪儿冒出这么一股不能忍耐的歪风，一味进行责难，大肆恶毒攻击，狂热地求神问卜而对现实不满。难道昨日的一切还是好端端的，今天就全是糟糕透顶？

或许在屈从宽恕、情感和俯首听命于无政府状态后，真个变得优柔寡断、缺乏理智了？

或许暴力、冒险胜过自由？纪律不是出于对人和人格的尊重而要强制执行？

或许长官意志真个比法律的权威更高明？

或许民族死敌真个能带来欢乐，而友邻必须赶走？

或许在“被困的碉堡”中生活比在无战争无暴力无武器的世界上更安全？

我不信！我不愿相信！因为，智慧虽然万能，但它一旦离开人，就会成为罪恶的“瞎炮”，就要惩罚人。那时就厄运在劫难逃了。我深信，对理智装聋作哑是暂时的，一定会过去的。无论是想入非非的浪漫主义者还是无所不知的先知先觉们，正确的思想终将把他们送回罪恶的天地。

站在一旁专门挑剔比什么都轻松。每个人还是公正地找找自己的毛病吧。找找个人的罪衍和失误、贪心和无信仰、懒惰和怯懦、丧失斗志和优柔寡断、忧郁和冷淡吧，问题还少吗？

我想起伟大的先哲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彼得堡编年史》中论述心地善良的人时写道：“这种人健忘，纯朴，毫不怀疑生活完全是一门艺术，活着就是要把自己变成艺术品；毫不怀疑，只有关心社会公益，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而不是在一旁打瞌睡，对群众漠不关心，不是离群索居，才能对真正珍贵的熠熠生辉的宝石有真知灼见，才知道它的价值、它的善良的心灵。”

是啊，生活已经离开熟悉的彼岸，天空也不是没有云彩。今天，问题比答案不知要多多少。

现在时兴说“没有”，改革没有精确的构想，没有实实在在的成果，革新没有前途，对形势没有明确的分析，行动没有坚定的决心……谁说一声“没有”，谁就赢得一片掌声；谁说一声“是”，谁就得不到信任，甚至更糟。偏见和猜疑重新侵蚀了人的心灵。

我还是要冒险说一声“是”。

主要的工作已经完成，即大家已达到共识，再象过去那样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容忍的，有失体面的；现实主义观点树立起来了，人们的头脑变得清醒了；整个社会正在觉醒，优点正在复兴，心灵和良心上的创伤清晰可见，对最高道德的呼唤清晰可闻，社会的民主支柱已经树起来了。

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如不属时间限制的东西，如剧烈改变俄罗斯千百年来的模式，如宣布向新的文明社会迈进。这难道不是突破？

现在没有什么不可逆转的东西了。这些不可逆转的东西存在于感觉不到、但又是切实存在的精神氛围之中。社会永远不会是以前那个样子了，认识上质的飞跃已经完成。

几十年来毒化我们头脑和情感的许多神话、陈规旧习、自